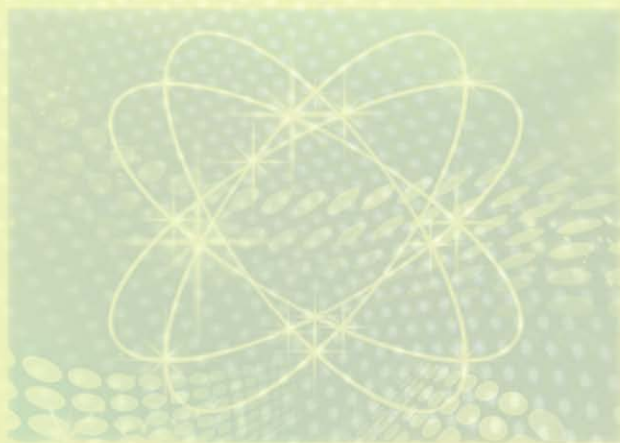


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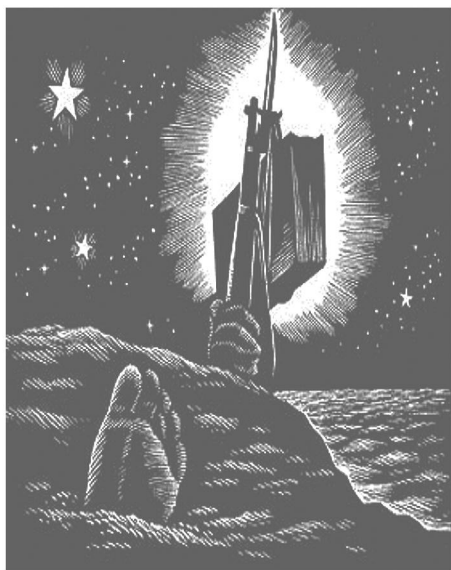
张育仁 编著



重庆出版社



REG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SERIES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 张育仁 / 著 •

重庆抗战新闻 与文化传播史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 张育仁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1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229-01220-5

I. 重… II. 张… III. 新闻事业史—重庆市—1937~1945 IV. G219.27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3210 号

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CHONGQING KANGZHAN XINWEN YU WENHUA CHUANBOSHI

张育仁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67 千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220-5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周晓风

编 委：张中良 程光炜 李 怡

周晓风 靳明全 郝明工

李文平 杨希之 朱丕智

秘 书：凌孟华

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30 个年头,在这段并不算太短的历史进程中,抗战史学界和主流媒体为了还原历史,进而将抗战壮丽史诗转化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亟需的人文资源,作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可是在今天,他们竟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2005 年 8 月北京十余家媒体以“你所知道的抗战历史”为主题联合进行采访调查,调查对象是 45 岁以下的青少年,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青少年的“无知化”比例相当惊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少年对抗战的历史如此隔膜?是市场经济和金钱至上主义使他们有意识地远离这段光荣的血火历史吗?其实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历史教育理念,出在我们对历史宣教的议程设置和选择目标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忠实地扮演着“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可笑角色。尽管抗战史研究早已在政治上开禁,尽管史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了一种历史常识,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教育理念已成为一种惯性或定势,因此,抗战史研究的成果很难及时转化为积极的普及性教育资源。以抗战新闻史为例,即使是在新闻界,在大学里,不少中青年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专业的学生对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内容,依然十分陌生,更遑论提及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他们那种茫然无知的表情,让新闻学专业的教师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可悲和可怕,当然更多的是痛感自己的失职。

无知和遗忘对历史而言,是不可宽恕的背叛。除了抗战史教育理念的缺失之外,几十年来,在有关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由于受“历史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双重干预,再加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铁律所限,出现了一大批以“革命戏说”为特征的经典电影,如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等。这些以戏说抗战而著名的经典电影至少有一点值得反思和检讨:把残酷的战争和艰苦卓绝的民族牺牲和抵抗,变为喜剧和闹剧。在这些影片中,



日伪军都是不堪一击的草包,民族解放战争的空前惨烈和牺牲的真实性和悲壮性,被嬉皮笑脸的“革命浪漫主义”肤浅戏说所完全消解了。在中青年的记忆中,抗战不过是一场非常有趣好玩,既无惊又无险的战争游戏。这种戏说套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实质上远比遗忘更可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抗战史学界的努力终于影响到抗战影视的创作,尽管未促成根本性的改观,但对“革命戏说”的反思和反感毕竟给影视界吹入了一阵实事求是的清新之风。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杨光远先生执导的,真实、客观、全面、准确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诗性巨片《血战台儿庄》。20多年后的今天,杨光远先生谈及当时冲破影视拍摄禁区的艰难过程,仍感慨万端。其实,剧本早在80年代初就已写出,但整整三年无人敢碰。杨光远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艰难地说服一个电影小厂——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该片以“重写抗战史”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再现了上至总指挥李宗仁将军,下至普通士兵的生动血肉形象,“即使对蒋介石也是正面描写,没有丝毫的丑化”。^① 该片的社会效应之好超过预期想象,不仅创下该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而且使广大观众在泪流满面中,既生动具体地知道了什么是正面战场,同时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令人感慨不已的是,“1987年7月,《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很快,蒋经国、宋美龄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蒋经国看后说:‘第一,共产党承认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展现,没有歪曲。’不久,蒋经国的大陆政策逆转,开始走向寻求两岸和解之道。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透露:这与《血战台儿庄》真实再现抗战历史有很大关系”。^② 由此足见,求真务实地对待和反映历史,是会极大地调动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的,而戏说历史却是永远不会收到这种积极功效的。

然而,值得忧虑的是,对抗战历史恣意进行戏说之风并没有因为《血战台儿庄》的出现有所收敛。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化戏说呈更加令人担忧之势。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流毒四川、重庆,乃至全国的方言剧《抓壮丁》及“王保长”系列、《傻儿军长》及“傻儿”系列电视剧作品。这类商业化、市俗

①② 白瑞雪:《拍摄〈血战台儿庄〉前前后后》,《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1日。

化作品在戏说的性质上较“革命戏说”更无知而且俗气十足。如果说,“革命戏说”呈现的主要是政治庸俗性和艺术肤浅性,那么,这类商业化戏说呈现的更多的却是歪曲、丑化加低俗和无聊;更由于在形式上采用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方言喜剧,因此,其对抗战史的歪曲和误导就更加严重。

《抓壮丁》这出四川方言喜剧原本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严重对峙、争夺天下之际,无疑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但影响有限。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重新由八一电影厂拍成电影。又由于剧中扮演王保长的名演员陈戈的出色表演,一时间影响全国。进入90年代后期,因为市场运作“有利可图”,于是又被再次发掘出来满足“市场需要”。就这样,整个川军英勇悲壮的抗日历史被闹剧式的表演而完全抹杀。而且,当年重庆及大后方民众自愿踊跃从军参战的动人历史也随之被涂抹得一塌糊涂。

八年抗战中,重庆及整个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不仅向前方将士捐献粮食7100万石,捐献寒衣1000多万件,而且更有300万子弟自愿参军出川参战,伤亡共达64万余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被后世传颂。即使已经过去了60多个年头,我在翻检大量的抗战史资料,特别是那些泛黄的抗战报刊时,我的灵魂依然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在此仅举几例。如《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报道:“新津县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老先生,十分痛恨日本强盗,他把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再如《新蜀报》1937年8月19日报道:“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他在送儿子王建堂出征之际,赠送的竟是一面‘死’字大旗。他在白布中央写了大大的一字‘死’字,两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有吾子,自觉请缨,赠旗一面,时刻防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战时,大后方的成都和重庆街头,爱国学生和群众团体常常演出街头剧《当壮丁去》、《最后一计》、《卢沟桥之战》、《王先生上前线》、《八百壮士》、《为国牺牲》等剧目,极大地鼓舞了城乡青年的参军热忱,哪有什么躲壮丁,怕上前线打鬼子的闹剧。尽管当时也有极个别的负面情况,但一经发现,国民政府当以破坏抗战严惩。而且四川省政府还适时制定了出征壮丁家属优待办法:“壮丁出征后,其家属可在积谷项下,一次具领优待

谷二市石;满一季后,每季度发九市斗,以三个季度为限。”^①切实保障出征战士无后顾之忧。“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上前线打鬼子光荣,怕当兵才是孬种”。轰轰烈烈的抗战把民众的旧观念一下全改变了。

可悲可叹的是,在《抓壮丁》和“王保长”系列方言剧中,四川百姓踊跃参军抗敌的悲壮历史被丑化为人人躲抓壮丁,家家怕抓壮丁,四川百姓被丑化成了毫无丁点爱国觉悟和热忱的愚氓、亡国奴形象。对此,抗战史专家愤慨地批评说:“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奔赴前线的,哪有强拉硬拖上前线的道理!”^②不仅普通工人、农民积极从军参战,青年学生更是热情高涨,“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沙坪坝选调随军译员,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四年级学生应征者达600人”。^③1945年9月3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发表《胜利日感言》,谓八年抗战中,“四川人民承负的粮食、兵役、劳役及其它建设,运输公役的公债储蓄税捐等各项负担,无不超过全国其它各省”。^④

与《抓壮丁》等方言剧对后方民众的丑化和歪曲有异曲同工之谬的还有“傻子”系列方言喜剧。该系列剧完全是循着“土匪占山为王——土匪出川抗日”的丑化路子,将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历史进行毫无史实根据的肆意歪曲。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傻子军长》中川军将领“樊傻子”率军在前线与日军交战,竟穿着戏装,画着小丑脸谱,哼着川剧唱腔,活脱脱一副小丑形象。其麾下士兵一个个阴司到阳、东倒西歪,活脱脱一帮乌合之众形象。这是真实的川军形象吗?非也!略知台儿庄大战历史的人都知道,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所部数千人几乎全部阵亡。李宗仁在总结时说:“没有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大捷!”^⑤自1937年9月5日川军出川抗日至1939年的两年中,近二十个师英勇牺牲近30余万人。在抗战中,川军高级将领英勇战死者就有王铭章、饶国华等。这支穿着单衣、草鞋,背着斗笠,扛着破旧武器——甚至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的古董步枪^⑥——的忠勇子弟兵,

①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② 郑光路:《川人的抗战》,《成都晚报》,2005年7月6日。

③ 《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④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⑥ 陆诒:《太湖边上遇川军》,《武汉日报》,1938年6月18日。

以64万余具血肉之躯筑成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川军的忠勇死战，竟连日本人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深表敬畏。而几十年后，我们后辈子孙中竟有如此戏说者，以喜剧和闹剧的形式在辱没忠烈先辈的同时，竟乐呵呵赚了个钵盈盆满。这种种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和忏悔吗？

我在书写这部《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这类催人泪下的历史资料，在对抗日先贤们致以无限崇敬之情的同时，对我们这些后辈子孙中的浅薄无知者不能不表示极大的谴责和忧愤。

今天，我们纪念和研究抗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和研究必须是在熟知历史，即在真实、客观、准确、全面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抗战历史的无知，当然是非常可悲的，无知者谈不上什么纪念，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对抗战历史的遗忘，不仅可悲而且可叹，遗忘者绝不会真正去纪念和研究什么；其实，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对抗战历史的种种功利性、庸俗化曲解和戏说，不管这种戏说是打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号，还是打着“娱乐大众，搞活经济”的商业化幌子。因此，好好地反省和检讨几十年来我们在纪念和研究抗战的历程中所走过的弯路，从而以一种严肃的、理性的态度来校正我们自己，并进一步校正我们审视历史的视角，岂不是为了更好的握取纪念和研究的真谛？今天，我们正在寻求建立和谐社会之道，若离开了对历史的真切认识和体察，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无从谈起，而且没有血肉历史的生命系结，我们的“现代化”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是我在撰写这部《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张育仁

2008年12月28日于重庆北碚夏坝
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旧址客舍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中国现代转型悲壮进程中的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1

第二章 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事业的形成/12

第一节 战时首都的确立与多元政治生态的构成/12

第二节 战时经济中心与文化教育中心的的确立/17

第三节 战时外交活动中心与国际化开放姿态/24

第三章 新闻抗战理念的流行与构筑心理国防的必要/30

第一节 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30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与新闻武器论/38

第三节 新闻抗战理念与心理国防建设/44

第四章 战时多元传播格局中的政党机关报/51

第一节 中国早期政党机关报及“党报思想”/51

第二节 国民党最高言论机关《中央日报》/54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队系统首席大报《扫荡报》/63

第四节 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新华日报》/69

第五章 战时多元传播格局中的民间大报/83

第一节 中国民间自由主义的旗帜《大公报》/83

第二节 致力于民族解放和中间道路的《新民报》/92

第三节 “报纸大众化”革命中的《世界日报》/100

第四节 公教立场伸张正义的《益世报》/105

第五节 以服务抗战为职志的《时事新报》/112

第六章 战时多元传播格局中的地方报纸/118

第一节 战前重庆地方报纸发展状况概述/118

第二节 徘徊于商营与官营之间的《商务日报》/121

第三节 以传播思想文化资讯为使命的《新蜀报》/126

第四节 深受《大公报》影响的《国民公报》/133

第五节 有利川事、造福川民的《济川公报》/137

第六节 战时重庆社会“百科全书”《西南日报》/143

第七节 战时重庆代表性的地方小报/148

第七章 重庆各报联合版及其他重要报纸/158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个创举/158

第二节 陪都时期的其他重要报纸/169

第八章 战时多元传播格局中的中外通讯社/179

第一节 战时重庆的中国新闻通讯事业/179

第二节 战时重庆的外国新闻通讯事业/188

第九章 战时广播事业与对外心战攻势的展开/201

第一节 战时广播事业的迁建与发展/201

第二节 战时对外宣传与“心战”指导工作/212

第十章 战时多元传播格局中的出版事业/222

第一节 战时重庆主要出版机构与文化传播实绩/222

第二节 战时启蒙普及读物与民族意识的觉醒/235

第三节 战时期刊的繁荣与文化战略的调适/242

第十一章	战时新闻学术团体学术期刊的创办与成效/255
第一节	战时新闻学术团体的创建与活动内容/255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术期刊的创办与研究方向/268
第十二章	战时重庆的新闻教育机构及办学特色/280
第一节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办学特色与成绩/280
第二节	战时党办新闻院系的办学特色与成绩/286
第三节	战时非党营新闻院系的办学特色与成绩/297
第十三章	战时新闻与人文教育思想的多元化呈现/304
第一节	复旦大学新闻与人文教育思想及代表人物/304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院新闻与人文教育思想及代表人物/313
第三节	重庆新闻学院新闻与人文教育思想及代表人物/323
第十四章	战时大众传播视野中的文艺观与文艺运动/328
第一节	抗战文艺与国家战略和民族情感的关系/328
第二节	战时戏剧和电影运动的大众化宣教特点/339
第三节	战时文学运动的大众化宣教特点/347
第四节	战时音乐和美术运动的大众化宣教特点/358
第十五章	战时大众传播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论争/368
第一节	文艺界“舆论领袖”意识的演变/368
第二节	文艺界“舆论领袖”与“议程设置”能力/375
第三节	舆论议题的设置与文化传播的变形/385
第十六章	战时军政外交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传播互动/391
第一节	战时中国与苏联文化传播互动的领域及特点/391
第二节	战时中国与美国文化传播互动的领域及特点/403
第三节	战时中国与英法文化传播互动的领域及特点/413
第十七章	战时新闻统制与新闻自由的角力/424
第一节	战时新闻统制政策的形成及理论依据/424

第二节 “新闻自由运动”与战时国内国际背景/433

第三节 宪政浪潮推动“拒检运动”的发展/443

第十八章 结语:立足与超越启蒙救亡模式的现代传播姿态/452

后记 追寻真切的抗战史迹,追怀伟大的抗战先贤/458

第一章

导论：中国现代转型悲壮进程中的 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了中国乃至远东反法西斯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其对国家、民族的复兴以及人类的文明走向所起的作用很大，因此，研究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流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描述和阐释这段峥嵘而特殊的历史，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的内容广泛涉及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领域，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关系尤其密切。

从中国现代史以及现代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同样是非常密切的。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它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焦虑和民族耻辱。在外国列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多重压力之下，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始终受到严峻的挑战。从那时起，所有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这种来自外力的压迫和挑战有关。抗日战争无疑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这一进程中所遭受到的最为严重的压迫和挑战。毫无疑问，战时重庆的新闻与文化传播事业，正是在悲壮迎击这种压迫和挑战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挽救亡国灭种危机为旨归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悲壮的迎战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逐渐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们通过不断的思考和传播，深刻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这种民族主义意



识也日益得到了强化,并最终成为促使中国选择现代化转型最有效、最能进行社会动员、凝聚民族情感和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神圣象征。抗战期间,中国各党派、各政治文化团体、民众组织,以及分属这些来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利益群体的大众传媒,他们之所以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为一个坚强的整体,并由此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传播事业,其奥妙就在于此。

从抗战传播的经验和绩效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外力压迫和挑战下所萌发的,它又通过各种现代的或传统的传播手段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和强化;更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因此,这种传播活动就不能不是一种既具有中国自身的传统内容,又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文化活动。从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情形来看,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传播手段当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作为传播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就是说,真正使传播发挥出巨大战略效力的,并不是战时的传播手段多么现代,传播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民族意识在抗击外力压迫和挑战时,所产生的精神魔力。战时中国就是通过这种民族主义意识,把散沙般的民众凝聚和动员起来,爆发出万众一心的精神能量;战时的中国传媒界就是通过这种民族意识,把分属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唤醒和组织起来,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①,谁就因此掌握了合法性政治文化资源。由此看来,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制定的政略和战略方针,尤其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令,之所以能得到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左翼党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各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团体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并结成广泛而较为牢固的统一战线,就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以及代表执政党进行国家管理的国民政府紧紧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在掌握合法性资源的同时自然取得了合法性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不仅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利益诉求群体的确认,而且在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下,将这种确认变成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浩大运动,变成了对国民政府政略和战略决策的理解、支持和积极贯彻落实的具体行动。

很显然,民族主义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使严重困扰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页。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或者说,价值理性暂时让位给了工具理性。客观来看:在抗战以前的数十年当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理性的重要内容,也是被中国的新闻与文化传播界奉为神圣价值的追求目标。在他们理喻中,近现代以来的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知识分子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和个体解放的价值追寻运动,而思想言论自由是个体自由中最重要和最本质的一种自由;他们坚持认为,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是衡量个体是否独立存在和是否受到起码尊重的先决条件,而且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化品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对报刊、广播、电影、图书等大众传媒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上,他们都作过立足于价值理性的底气十足的阐释和发挥。在那数十年当中,他们热衷于办报办刊,或鼓吹民主,或宣传科学,或主张人权,其实都是为了寻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并以此来判定个体价值是否得到确认和实现。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战前中国的民间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民间传媒界对思想言论自由追求之急切,对历届政府批评指责之凌厉,就会知道,个体独立、个体自由在他们的价值追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但是,与个体的思想言论自由相比,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常常显得更有分量。尤其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外力压迫和挑战的严峻时刻,个体的思想言论自由似乎显得不是特别重要了。也就是说,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会主动说服自己暂时放弃对思想言论自由,或曰新闻出版自由的价值追寻,而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置放在其价值追寻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并经常性地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追寻方向,特别是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主流方向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同时,民族主义也使工具理性重新浮出水面。工具理性由隐而显,并不是表明中国的传媒界及整个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此完全放弃了对思想言论自由的价值追求,而是在着眼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前提下,暂时将价值理性搁置,而服从于工具理性。这种两难中必须做出抉择的情景,充分反映出战时中国传媒界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以及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决断能力和牺牲精神。在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公报》,



其表现就最有代表性。在张季鸾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的政府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发抒精诚,做到钢铁一般坚固的团结。那就是说,要精诚纯一,一切的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奋全力拼死以争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没有民族国家的自由,哪里还谈得到言论的自由?”^②在《国家战时军治化》的社评中,这种复杂的心曲再一次被我们所感受到:“我们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但在今日,为抗战利益计,则必须加强国家战时的军治化,全国凝为一个整体。”^③中国的新闻与文化传播事业,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和文化公式:办报办刊是为了开言路、启愚蒙、新民德,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工具理性不仅表现在中国的传媒界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对报刊功能及性质、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上,更奇异的是还深刻表现在他们对个体自由,特别是作为个体自由核心价值的思想言论自由的认识和理解上,也明显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在他们看来,个体自由唯有在国家、民族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上,才具有价值意义,否则无所附丽;倘若国家、民族没有自由,个体自由不仅毫无价值意义,而且连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也没有了。在抗战初期,中国的传媒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主动提出暂时牺牲个体自由,而服从国家政略和战略的需要,既来自于工具理性的召唤,更来自于他们心中那个神圣的,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的指示。从这种意义上来对他们的选择进行评估,我们必须得肯定,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悲壮而崇高的。

工具理性为什么会上升为这样一种道德律令?我们在研究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新闻界和文化界在一段时间里,对全能主义政治及其产物——战时新闻与文化统制政策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的确是战前大相径庭的。在战争初期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战时新闻学”和“战时文艺学”,或曰“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颇能说明问题。不可否认,战时新闻和文化统制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固然是全能主义政治所必然带来的结果,是战时军治化的必然产物。但若从工

① 《大公报》,1938年7月8日。

② 《大公报》,1939年9月1日,社评。

③ 《大公报》,1938年1月14日,社评。